

求教琐记:我的老师康正平

沈建中

在我十七八岁赶上“新时期”，——我的求知时代，也是多数青年人喜欢写诗的年头，从学画及至欣赏文学、戏剧、电影、音乐乃至读哲学、阅史书，五花八门样样接触，热潮、思潮、流派应接不暇，浅尝辄止地溜达一大圈。好像突然间的事，摄影一下子闯进了我的生活。那时凡文学艺术各门类一派热闹景象，适逢“五讲四美”的岁月，为学艺到处“求师寻友”，是“学习学习再学习”的重要途径；稍不留神就会听说某某名师、名家、高手，或是邻居或住那个弄堂，随之造访；如在或师或友家里高谈阔论至夜半，亦不为怪。现在回味这种教与学环境，颇感热情且美妙。如今却少见这样佳境，也难觅如此良机。

我学画的老师林毓伦先生在市园林局任职，得知我喜欢上摄影，便请下放到虹口公园的摄影前辈康正平先生（1913年—1996年）指导我学摄影。初次拜师约在人民公园，林老师和康老正在筹办上海市菊花展览，我跟着林老师各自推着自行车进了公园大门，在布展现场见到身材魁梧的康老，灰发寸头，南口音音，和蔼可亲地说，以后找他上午去虹口公园，下午可去乍浦路《民主与法制》杂志，晚上就到武昌路家里。

想当年上海每逢秋高气爽，公园举办的菊展盛况空前，康老拍摄的名贵菊花组照陈列在各大公园的橱窗里，我也跃跃欲试拍菊花，还拍斗蟋蟀，拿着照片去讨教。康老指点三五后，看着照片思忖良久，说他从前也拍过这类题材，发表在画报上，手头无存，否则可给我看看。听康老意思，我的拍摄明显有问题，最好是先观摩他的作品，让我能有点自省解悟。当时我已去徐家汇藏书楼翻阅旧刊，一回看到林语堂主编《人间世》，每期都整页刊登文艺家肖像，虽是陈年旧刊，可我感到新奇。因此，当即表示可去查阅他的作品，康老喜出望外地说了在1940年代发表的几种刊名，使用笔名，我都记下。经过一段时间查找，最近翻看了当时记录本，除他供职的“良友”外，在“中艺”“今日”等十几幅画报上，以及《京沪周刊》《光化日报》等都刊有其作，我竟能找到他《秋天的英雄》《秋菊多佳色》（《艺文画报》1946年第4期）多幅并翻拍给他，着实使康老高兴，我也渐渐地对拍摄这类作品有些许领悟。

当然，我最看重的是他拍摄的历史影像：《北平日军缴械》（《民国日报画刊》1945年第3期）、《胜利号角声中瞻望政治协商会议之重开》（《生活》1946年第1期），多极了。我很惊讶，原来康老也是赫赫有名的摄影记者，在旧报上还见到同行呢称他“康胖”，1940年代下半期他主要以《良友画报》记者的身份发表。某天下午我随意跑去《民主与法制》办公室找他，不巧没见到。当晚我又去他家里，他乐呵呵地说在那里是义务帮忙的，是想恢复记者专业，外出采访有自己身份，还可报销胶卷费用并建了冲印暗房。

康老告诉我，很喜欢在画报上发表摄影作品，版面宽裕，图文并茂，比报纸印的清晰。这一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从前画报上大都整版或跨页刊登他的组作作品，在我小本上查阅记录有《十四年苦难东北人民的笔笺》（《联合画报》1946年第169、170期合刊）等诸多，这些组照均以多角度、多侧面来作详尽的深度报道。我反复琢磨他的纪实专题摄影，咀嚼体会，启发我对摄影重新认识。按最初浅陋见识，除新闻摄影，就是以晨曦晚霞的山水风光、赏心悦目的花鸟鱼虫为题材的闲情逸致“沙龙趣味”摄影。我开始模仿康老的摄影视角，寻找类似纪实题材及拍摄方法，取向专注于记录社会发展现状之专题，用镜头聚焦在石库门房内的延中街儿童寄托所、弄堂里最早的张家宅街道工疗站、简陋旧房的首家南汇关怀护理院、供养伤残军人和英模烈属疗养院。我会想起康老抗战胜利深入敌，从东南到华北再赴东北，进行深入地摄影采访的情形。我试图学着以赋予责任感的镜头去观察、去发现，用情感的快门凝固与命运搏斗的影像，胶片不可遏制地卷动组合形成“人道关怀”摄影专题，期待唤起社会关注、群众关爱，如能惊醒肥马轻裘者的麻木神经，亦为善事。

《寰球》杂志刊有他的《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1948年第35期）等组照，在我，无疑又是一大示范。当年上海金融恰好进入发展期，百姓投资意识如梦初醒，各类情载着极其诱人获利信息，我开始用照相机追随迅猛变革的步伐。我把拍的照片拿去请教，康老又是不置可否，亦无鼓励，最后说了句：都是拍排队和拥挤的营业厅，没啥意思。在快快而回的路上，忽然想起摄影家罗伯特·卡帕教导：“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离炮火不够近。”康老的意思与大师的话如出一辙，教导我最大限度地近距离目击：上银行存款能获紧俏的彩电、自行车购买券，市民通宵达旦排队的兴奋神情；债券兑付

日，银行柜台前闪现的激动神态；外汇调剂中心交易员靠笔纸记价、电话报价，折射双重汇率下外汇体制改革艰难起步；沪上银行在全国率先推出国库券买入卖出，营业厅木制挂牌品种寥寥无几的行情表，却显示迈向全国证券交易中心第一步。凡此，形成我的“上海金融潮”摄影专题。

1981年冬天，虹口公园要欢送他“光荣退休”，他嘱我为他全程摄影留念。当日天气暖洋洋的，早上先到虹口公园集合，在会议室举行欢送座谈会，有香瓜子、长生果和鲜桔汽水招待。欢声笑语中，我才了解康老先是从《文汇报》被下放郊区农村劳动，参与拍摄上海农展馆布置照片，再被安排到虹口公园做照相。公园主任给他戴上大红花，颁发装镜框的“光荣退休”证状，我拍了好多合影照。随即请康老坐上东风牌客货车驾驶室前排右位，几位职工组成的锣鼓队站在载货后厢敲锣打鼓，沿着四川北路往他家慢慢行进，我骑着自行车或前或后追逐拍摄。过了几天，我把洗印好的照片送去，康老把照片摊放在饭桌上，反复看着，满脸喜滋滋很享受的样子，轻声说他的“历史问题”全部解决了，所以能得到这样的退休工人规格的待遇。他退休后，仍然早出晚归忙于摄影活动。我见闻他的事情，久之便感觉他不论遇到何种挫折，都始终洋溢着锲而不舍的热情，我体会出他百折不挠的精神，让我深深领教忍耐性格，对我产生榜样作用。

有段时期，我三天两头一下班就去康老家玩。晚饭后，他的孙儿回自己家，孙女在一旁做功课；等康师母收拾碗筷、擦净饭后，他就从大纸盒内取出发还的底片照片，摆放在饭桌上整理，把底片装入专用纸袋编号，注明拍摄年份。很多泛黄照片，他视若宝贝说，最好能整卷存影集内。当时买一本大号影集就会觉得价贵，何况如有十来本影集还不够。我向照相馆做洗印的好友求得许多大张黑卡纸，自制相册数十本。他采访许多名人要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各界风云人物集聚在他的镜头里，应有尽有。我尤其喜欢看他拍摄文艺家茅盾、张大千、溥心畲、梅兰芳等相片，他拍的齐白石大半身像，我觉得比先前很喜欢的郑景康先生作品《齐白石》，格调不同，更有亲近感。他也会顺便讲些从前采访经过，他早听同行讲过1930年代中期，郑景康为齐老拍了一卷120胶卷，齐老送《虾趣图》；周维善为齐老画肖像，齐老赠《东方朔偷桃》。几天后齐白石却在客厅写了“双方不合算”，言下之意不愿再应酬相画像之事。而康老排除困难并顺利拍摄的经历，使我在潜移默化中得到采访能力的提升。数年后，当我在为文坛学界前辈摄影途中遇挫受阻时，就会想起康老经溥心畲介绍到北平青龙桥拍摄沦陷时拒不出演、避居城外诵经明志的程砚秋

足珍贵。后来我也效法，每每为前辈摄影后，只要有可能，都恳请题词。

有次翻到几张1943年蔡龙云先生作为年龄最小选手参加中外武术对抗赛，击败俄国拳师马索洛夫的照片。康老津津乐道地回忆次日各报都刊登他拍摄的照片、市民争相购报的情况。我正处尚武年龄，也算小半个“功夫”爱好者，便央求带我去拜见这位鼎鼎大名的李小龙的偶像“神拳大龙”，想不到康老没几天就打电话联系好了，带我跑到江湾五角场上海体育学院武术教研组办公室，终于见到心目中的英雄豪杰蔡龙云教授。我坐在一旁听他俩叙旧，1946年“神拳大龙”又打败美国重量级拳师鲁赛尔，也是由康老拍摄留下珍贵照片。随后来到大操场上拍摄蔡教授练武，一招一式，看得我热血沸腾。大约过了一二年后，我还想去为“神拳大龙”摄影，康老告诉我，蔡教授奉调北京在国家体委任职，数年后我偶然得知蔡教授长子与我同在一家银行上班，貌相逼肖其父而又低调，银行里很多人并不知其名门事迹，而我知道，自感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缘分。

接着康老又带我去田桓、陈秋草、沈迈士等老人家里摄影。一次在刘海粟老人家里，海老讲，过几天要去上海美术馆参加画展开幕式，其中有两幅张大千画作。出门后康老对我说，这应该是张大千作品在1949年后首次于大陆公开展出。开幕那天，他带我去拍摄了海老观看张大千作品的情景，说是“海峡两岸画家骨肉情”的历史性瞬间。康老与当年家喻户晓的长寿书法家苏局仙老人是南汇同乡，1982年元旦要隆重举办“苏局仙百岁大庆书法展览”，康老提前数日带着我乘坐长途汽车到周浦牛桥村苏府“抢拍新闻”。这些采访经历丰富了我的摄影思维方式，我之所以能够致力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家肖像”摄影专题，当然受到康老不断熏染，我的这一摄影取材倾向，大约早在那时就渐渐萌发了。

最初是康老借给我几册新华社摄影部编《摄影技术参考资料》，还借我很多港台、新加坡、日本的摄影刊物，在他推荐刊物的启蒙下，从所见有限的作品，我开始接触到亚当斯、卡希、纽曼、哈尔斯曼的作品，在人物、纪实摄影的技法方面，算是开了眼界；后来能看到更多的，当推布列松、威士顿、曼·瑞、比索夫、史密斯。再后来就酷爱寇德卡、萨尔加多的作品，显然是题外后话。

1980年代后期，我所供职银行办的期刊已是“公开发行”刊物，为使图文并茂，我操办两届新闻摄影比赛、展览和新闻摄影研讨会，推进摄影报道在期刊上使用。这样，我去向康老求教也是越来越少了。倏忽间很快跨入1990年代，骇世惊俗的股票狂潮犹如强劲急浪，外白渡桥下日夜排着长队开办股东账户卡，只要买进股票就赚钱，不知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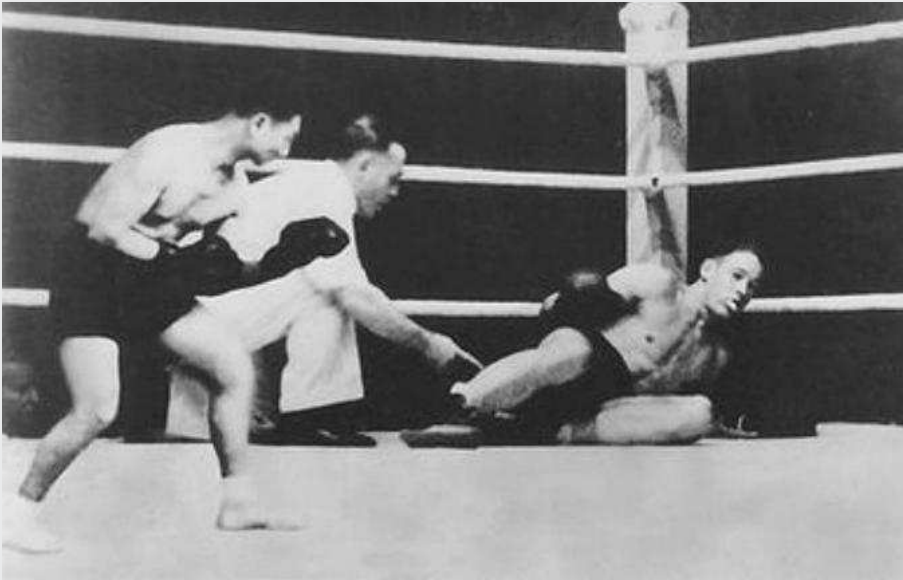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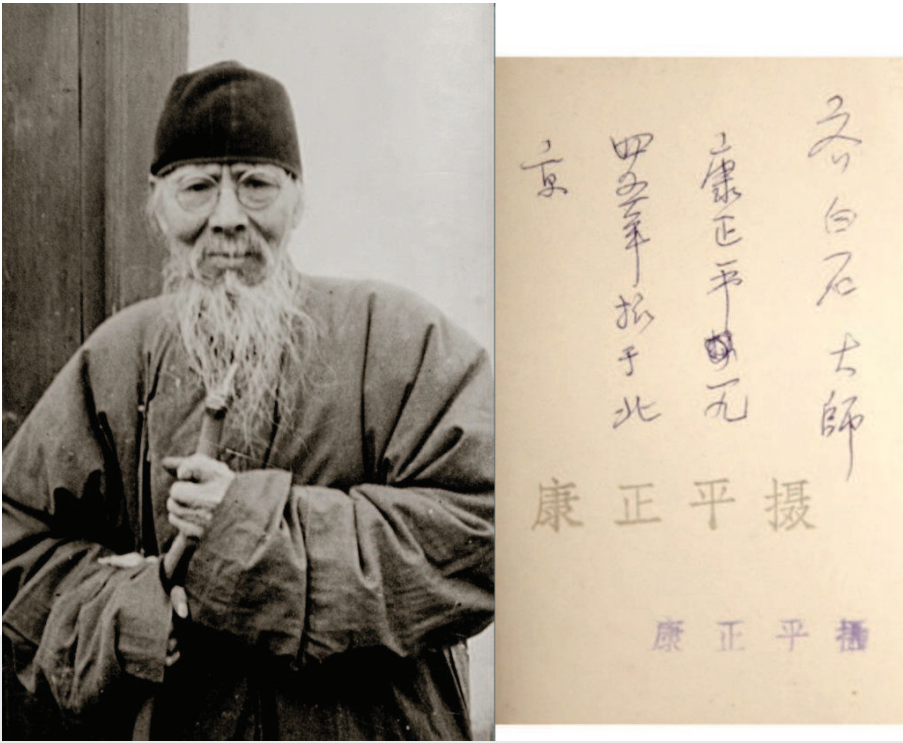
多少人，再也按捺不住投入股海，我拿起“尼康F3”也跟着扑进汹涌股海。

有天突然听说康老寓所已在动迁，我立即抽出一个上午去帮忙，一大早就到武昌路，沿街那排楼已成废墟。失望之余掏出照相机，快门闪动或许触动我察觉变迁大都市的另一面，推土机铲翻都市村庄，伴随打桩机轰鸣声是惜别眼神，塔吊铁臂挥舞间是惆怅神情；在满目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的钢筋混凝土丛林里，在匆忙电梯、单调走道和紧闭铁门之下，看不到出门乘凉的老头老太，听不到嬉笑孩童的喧闹。从前康老定格的城市印象《黄浦江上看龙舟》（《春秋画报》1947年第8期）、《几个有意义的纪念日》（《艺文画报》1947年第11期）、《上海劳动阶级的露天娱乐》（《寰球》1947年第17期），在我的脑海里浮现，使我惭愧。于是寒暑晨昏，我沿着尚未动迁的路线，寻觅里弄深处的邻里情感，拍摄一幅幅质朴世相图。

几经辗转打听，才得知康老寓所迁至国际电影院隔壁后弄室内。一个午后，我按门牌号找到叩门，未有回音，随敲旁边窗户，不久康老应声开门，相见甚喜，原来他尚在午睡。进门灶披间，再入客堂间，被分隔前后两间。他说，还另分了一套在附近；幸亏文史馆王馆长亲自出马沟通，否则要搬迁很远。寒暄一过，我看他一人在家，正要问康师母，他神情黯然地指指墙上供着师母照相，我大惊，竟拙于辞令，默然久久。康老从桌上几本相册谈及手头还有曾藏于南汇乡下的底片照片，亟待整理。说了一阵，我自惭实在爱莫能助，怎么办呢，只得讪讪走了。康老陪我走出暗暗的弄堂才握手告别，当我走过嘈杂的海宁路挤入闹猛的四川北路，夕阳斜射，一下子感到有些晕眩。

虽然，康老早在1940年代两次在上海、1950年在香港举办过摄影展，我在旧报上看到评论称赞其作。记得在1985年间，他兴奋地告诉我，刘海粟为他题写了“康正平摄影历史资料展览”，为啥要加上“历史资料”呢，是与他的斋号“集古摄今斋”相呼应——摄影作品能成为史料。然而，这一摄影展的计划却落空了。而他摄影生涯六十年的作品至今也没有整体出版，好多了解人士说康老拍摄的照片具有相当历史价值，我以为特别是1940年代的，包括1950年代初期。那么，既有价值，那就有待整理、编集和研究。怎么办呢……

又去探望康老，那回他兴奋地告诉我，文史馆沈飞德先生专门采访他，请他回忆从前摄影采访经历。我真为他老人家感到高兴，脱口而出：这是“口述历史”。后来听说他人住养老院了，再后来听说他患了脑病……我至今仍在想，康老虽有随遇而安的处世性格，但他对摄影事业始终不离不弃、锲而不舍；如果一旦离开心爱的摄影，就会很寂寞的。



康正平

摄影作品

图1:齐白石像

图2:1943年12月13日年仅14岁的蔡龙云击败俄国拳师马索洛夫

图3:秋天的英雄

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与高等研究院支持我召开了一个科幻研究会议。在设计会议的时候，我已经考虑，或许不需要仅仅局限在狭义的科幻文类。因此整个会议的设置，从科幻小说，到借用科幻小说元素的实验文本，到打破现实与幻想界限的文学作品，都已经包括在内。参与会议的作家们，可能也已经意识到这个设置背后的动机。每当过去科幻作家开会，仅仅只与科幻作家接触，或者所谓纯文学作家开会，可能不会想到邀请科幻作家参与讨论。那种情形在香港会议中被打破了。以至于最后一位作家应邀发言时，很真诚地坦言，他本来对科幻没有兴趣，通过科幻作家的发言却深深地被吸引了。同时，他也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科幻应该走向文学，而不应该仅仅走向科幻。

这话让我想了很久——这句话本来很简单，立足点应该是在文学的品质。但中国科幻的位置，却一直存在模糊性。曾经有一个时期，科幻作家们，评论家们，甚至科学家们，热烈地讨论过科幻究竟姓科，还是姓幻。

在当时，这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当中国走向科技现代化的时候，姓科绝对是正确的。姓幻则被认为是某种偏离正统思想的倾向。在那场大讨论中，科幻不明不白地被认为姓幻，也就是被认为没有科学性。结果造成中国科幻小说一个长时期的断档。直到二十一世纪初期，科幻重新兴起，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前几年，科幻到底姓什么的问题，终于得到完美的解决。科幻作家被吸纳进入科普学会，这也就意味着，科幻归根结底可以姓科。必也正名乎？科幻进入了科学的领域。

然而，我在前年复旦大学举办的另一次科幻研究会议上就提出，科幻既可以姓科，也可以姓幻，但最重要的，科幻其实也应该姓文。两年后听到的这句话，可能比我更为确切地表达出科幻与文学的关系。科幻小说，是凭借文学的载体、语言的符码来呈现的。在这个意义上，无论如何，科幻首先是一种文学形式。即便是类型化的文学形式，科幻的写作也首先建立在文学形式之中。

或许有许多原因，造成一些中国科幻作家排斥对于文学的认同。这部分是因为科幻在长时间内是边缘化的文类，没有被主流的文学界接纳。另一个原因是科幻小说确实还有自己独特的话语方式。科幻必须有科学话语，即使其中的科学技术是无法证实、异想天开的，甚至根本不能算是科学。但科学话语是一种符合内在逻辑性的真实性话语。科幻话语不需要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注脚。科幻话语直接指涉在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看不见，或者无法言说的事物。假如是成功的科幻小说，这种看不见现实会得到具有逼真真实性的表现。在这里，真实不等于现实。现实感取决于人们与内部或外部世界的关系。真实性则首先在语义的层面成立。

比如读者熟悉的卡夫卡小说《变形记》，这不是现实主义的小说，但这个小说的文本却有真实性。读者明明知道这故事是假的，却在语言层面上能够接受它带来的真实后果——这终究甚至会改变读者对于现实的看法。科幻小说比作为寓言的《变形记》要更加严密地建立真实性原则。假如《变形记》是一篇科幻小说，作者大概不能随便地把格里高利变成甲虫，一定需要借助于某一种科学话语来描述格里高利变成甲虫的合理化原因，即使那个合理化的原因没有现实基础。然而，在描述这种变形的后果时，科幻小说也可以更加有说服力地表达出对于现实成规的挑战。什么是现实？什么是真实？什么是我们通过语言可以描述的真实？什么是我们无法通过语言表达的真实？

以上的这个例子其就是用来说明，科幻小说不见得仅仅依赖科

《三体》之后，从科幻到文学

——对当前科幻小说的一点反思

宋明炜

幻的点，或者仅仅是投入幻想世界架构之中。科幻小说在诗学的意义上，具有建立在真实性基础上的语义、修辞和文本性。用更为极端的例子来说，正如著名作家韩松曾经说过的那样，现实可能比科幻还要科幻。这样一种说法，就是在否定我们寻常认为的现实感。或许现实当中充满了神奇、未知、神秘的时刻，只是我们看不见，或者我们害怕看见真实。但透过科幻依据其自身真实性构建的日常生活肌理，日常的现实可以退得远远的，读者直面不可思议的真实。这种真实会带给我们何种启发？侏罗纪公园里的恐龙是不可思议的真实吗？刘慈欣小说里面的黑暗森林是难以琢磨的真实吗？

本文试图提出的，其实是一个大问题。在这有限的篇幅里，讨论只能到此为止。科幻小说如果姓文，科幻的文本性可能比科学话语、幻想世界架构，都更具有基本的功能。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科幻具备一种独特的诗学，这是与传统现实主义不同的，与近代的现代主义也不同。科幻诗学指向我们通常看不见的真实，现实中难以言说的层面，当然也指向不存在的未来，尽管未来一定与此时此刻密切相关。

中国科幻仍在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在《三体》成功之后，原来的科幻作家群都在努力发展，新锐作家更是急切地进入领域。只是在后《三体》时代，作家们可能仍需出对于现实成规的挑战。什么是现实？什么是真实？什么是我们通过语言可以描述的真实？什么是我们无法通过语言表达的真实？

以上的这个例子其就是用来说明，科幻小说不见得仅仅依赖科

